

孙奇 著

孙奇日记

——政协工作八年纪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

SUNQAIRIJI SUNQAIRIJI

孙奇日记

——政协工作八年纪事

孙 奇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奇日记：政协工作八年纪事 / 孙奇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73-2836-3

I. 孙… II. 孙… III. 孙奇—日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1382 号

孙奇日记

——政协工作八年纪事

著 者 / 孙 奇
责任编辑 / 吴少京
装帧设计 / 杨 勇 王珏菲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 / <http://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辽宁美术印刷厂
印 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32.5 印张 24 插页 312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836 - 3 定价：5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序

(一)

1930年，我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大四家子乡(村)，自幼家贫。

翌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破山河碎后，我三岁父亡，八岁母故去。孤儿不孤。

记得在母亲死后，我已9岁，靠大我12岁的哥哥孙希贤给地主当长工，挣得粮食养家糊口。面临着该给有钱人家当猪倌时，哥哥鉴于我身体较弱，还算聪明，不忍心让年小弟弟与他一样再给地主当牛做马，就让我去大四小学念书。当时学校读书的孩子，多是有钱人家和一些家庭条件稍好的子弟，而我是穿着带补丁的破旧衣服，露脚趾鞋，拿一块旧布包书的穷人家孩子。自知哥哥供我念书不容易，要争口气把书念好。正因为有这种负疚心而自强，所以，我从小学二年级起一直到高小(当时称“国民优级”)毕业，在班里都以优异成绩领先。

哥哥供我读完小学，伪满时如再升学，一是考国民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初、高中)，二是考师道(现在师范)学校。哥哥明白弟弟倘若考前者，费用靠自己给地主当长工是供不起的。哥哥说，你去考师道学校吧。如能考上，官家供吃饭，减轻家里负担。1944年冬天，我14岁时，徒步去昌图县城(现在的老城)，住宿在大车店里，到东城厢学校去参加师道学校招生考试。考的科目是日语、满语(即中文)、算术、1000米跑步，加口试日语。不多日，就收到了伪满洲国立师道本科学学校录取通知书。

正在哥哥和我都高兴的时候，不测的事情发生了。哥哥被伪满警察抓走当劳工去了。这一变故，对我的家庭、嫂嫂和我，有如晴天霹雳，

天塌了一样，吃饭都成难题了，哪里还有条件能上师道学校念书啊？！当时家里连一身像样的衣服、被褥都拿不出，想买也买不起呀！

我只好去给人当“半拉子”（农村童工，干半个人的活，赚较少的粮食），种地时踩格子、扶拉子、压地，铲地时扔“节骨”来回铲一条垄，歇气时打井水……好在打工10个月，除供吃饭外，给一石高粱（当时农村称粮食衡器为升、斗、石，每斗大约45市斤，10斗为一石）。

1945年8月，东北地区大雨连绵，辽河流域发大水，招苏台河改道，我的家乡——大四家子一带全部被淹，当然那时也无人搞“抢险救灾”。就在这时，从县城里回到农村的人说：“日本鬼子倒台了，大鼻子（苏联红军）来了”，“日本鬼子可怕大鼻子了，一见着就缴枪……”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哥哥，也跑回家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怕苏联红军的情况：“日本人一见红军，就急忙点头哈腰，连说‘哈伊’。”

这时的农村也沸腾了，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知道不再当亡国奴了，我们是中国人了。每到夜晚，村中的空地上，都自动聚集很多人，相互传递着自己听到的消息，就像现在消息发布会一样，吸引很多人去听。一些有文化的人，也谈论中国的领袖是蒋介石，中国军队是中央军。也有人知道还有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

秋末冬初，一些八路军陆陆续续从南向北过去，他们多穿着灰色的旧军装，枪支也不都一样，见着群众说话和蔼，都称“老乡”。也有些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群众听了半信半疑。

1946年春，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中央军，从南向北开进，很多人看到都赞美称颂，有钱人家自动出大车帮中央军运给养。没过几天，传回来消息，八路军在金山堡摆下口袋阵，一夜间消灭了美式装备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财主王四抠的大车夫梁朝喜，从战场跑回到屯子里，就大讲起八路军打仗可真厉害。

1946年，昌图县的大小城镇，都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清剿队”的地盘，而辽河、招苏台河之间，是共产党县大队、区小队的游击区。我的家乡，白天是国民党的“清剿队”有时去放几枪，就回金家镇了；晚上，共产党县区干部过河来开群众会，宣传要减租减息。这一年我与哥哥用

人工换来牛具，耕种奶奶死后分得的遗产——十几亩地，此外还卖些零工。

1947年12月15日，昌图县城最终迎了解放。早在秋季，我的家乡共产党土改工作队就已进村。冬天进行斗地主、分田地，穷人翻身了。这个冬天雪很大，天虽很冷，翻身农民心很热，也十分快乐，很多人会唱：“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天，晴了天，庄稼人翻身哪！过个快乐年哪，啊哈，啊哈呀……”歌声唱出了农民内心的喜悦，也流露出翻身农民的期望，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孩子能上学读书，不再当睁眼瞎（文盲）。

（二）

1948年初，人民政府普遍建立学校，大的村屯成立完全小学（六个年级），小些的村屯成立初级小学（四个年级），再小些的屯子设分校（只有一、二年级）。大四家子村因为是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所以成立了完全小学，我被选聘为大四完小教员。

先后被选聘到三区各学校当教员的，多是伪满时期上过国高的学生，我只是为数不多的高小毕业生。自知文化水平低，在积极投入教育学生的同时，还挤出时间看书学习。年末，三区政府对全区教员进行政治、文化、数学等考试，没想到我竟考了全区第一名，在教员中引起轰动，从此被刮目相看。

欣逢翻身解放，又当了小学教员，我对党和政府无限忠心，满腔热情投入到学校工作中。1949年初，中共昌图三区委员会书记任守义、组织委员张林春二位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欣然表示要求加入。因为家、学校和区政府同住一条长街上，我在学校中的表现区上都了解，年末全区教员考试成绩优秀，区里领导都知道。他们二位就直接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在全区教员中是第一个入党的。

1949年2月，中共三区委员会、区政府，从大四家子搬到金家镇，我同时被调入全区规模最大的金家完全小学当教员。8月，区委书记任守义同志找我谈话，说县委指示，要在区、街、村等基层建立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组织，区委决定调我到区委任青年干事，负责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基层团组织工作，问我同意不，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当时教员是工薪制，区干部是供给制。任守义书记问我：你是保留工薪制，还是和大家一样过供给制？我说和大家一样过供给制。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传来，金家镇各行各业无不欢欣鼓舞。教师、学生、各单位职工打起横幅，手拿五星红旗，上街游行庆祝，敲起锣鼓，吹起唢呐，扭起东北大秧歌，高呼口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月，区委领导告诉我，县里通知让我去辽西青干校学习。我领取了路费，行装也很简单，身上穿的是棉袄棉裤，脚上穿的是棉胶鞋，背上被褥行李，就去了县城。尔后，带上县委介绍信、党的组织关系，坐火车赶往锦州，到北大营的辽西青年干校学习。

这段学习，由短期班到长期班，由北大营到锦州市区，由辽西青干校到团校，由团校到省委党校团干班，从1949年冬到1950年秋，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直到1950年10月国庆节后才结束。因为朝鲜战争局势紧张，美国军队向鸭绿江边逼近，中共辽西省委决定，在锦州的省委党校学员（包括团干班）、行政干校学员一律结业，回到原地，参加抗美援朝。

回顾在辽西团校近一年的学习生活，对我的一生有很大影响。当时我入党时间不长，又很年轻，对革命理论知识如饥似渴。在课堂上，我对教员讲课认真听取并记笔记；课下，利用有限津贴费，买些书籍阅读。这也是我一生中离开工作岗位、集中精力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次。它帮助我树立了革命理想信念，坚定了党的观念，给我一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昌图县后，我被派到双庙子区任团区工委书记，不久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副部长，县委生产合作部副部长、部长。1956年春，被调到中共铁岭地委，先后在生产合作部、组织部任科长。1958年末，中共铁岭地委撤销，我被派到中共铁岭县委任常委、组织部长，进入县级领导班子。

参加工作后，自知文化水平不高，深感知识较少，故常挤出时间看

书学习，认为有用的就摘记下来，以学补愚。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逐渐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经常到村屯，到县乡去跑面检查，蹲点调研，回到机关，要向领导汇报所闻所见，及对工作建议，都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没有工作记录，就难以讲得有理有据；还因为有时要写材料，起草文件，都需要素材，有了工作笔记，就可随时从中选择。坚持记笔记，还帮助我增强了记忆，以勤补拙，以防重要事情被遗忘误事。

很遗憾的是，当年从事具体工作时所写笔记、日记，当工作岗位一变动，离开原来的部门时，就觉得没用了，没再保留，因为当时也无保存条件。

(三)

1961年春我任县委副书记，分担的任务更多了，人也到了而立之年，由于工作需要，养成了写工作记事习惯。加之精力充沛，所以每天所接触的事情基本都有记录。那时还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深翻土地等等，以后搞“反右倾”，又搞“小四清”、“大四清”，时代变革大事很多，对此多有记载。

到1965年4月，我调离铁岭县委到法库县委工作时，6年半的时间里，记了近50多本工作日记。临行前，我捆了两捆，交给铁岭县委机关档案室保存，待以后来取。

1965年5月，我到中共法库县委工作。不久，中共沈阳地委就在法库县开展“四清”运动，我投入到紧张的“四清”运动中。

1966年5月，“四清”一结束，我被任命为中共法库县委书记，随即又带领几百人工作队去昌图县参加“四清”运动。昌图“四清”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烽烟四起，11月，工作队都回到县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不久，我就被罢官，经历了反复的被批斗，多次遭毒打，被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后又被专政，关进铁窗牢门，受尽各种酷刑，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几乎人亡家破。经过九死一生，总算活了过来。

1970年初，被铁岭地区“革委会”抽调到昌图县基层蹲点，后派到三江口农场，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1972年初，又被选进中共昌图县委任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初，到中共铁岭地委任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春到1983年春，任中共朝阳地委副书记、书记。干了8年，我记了58本工作日记，约有400万字。它记录了天灾人祸给朝阳农村经济造成的危害；记载了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与群众顽强的抗灾精神；详细记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同志到朝阳视察灾情的经过；记载了农村改变“一大二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也详细记录了我被诬陷的前前后后。

1983年春，我到省政府任副省长，分管农业、商业工作。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后的大丰收的喜悦；感受了粮食突然多了后，国家仓储条件不足，农民卖粮难的“困扰”；亲历了1985年辽河流域大洪水，沿河地区群众严重遭灾、财产损失，使全省粮食一下减产近90亿斤；深刻领悟了“辽宁”的含义——辽河治理不好，辽宁难以安宁。

1985年秋，我到中共辽宁省委任常务副书记，又历时8年，协助书记处理省委日常工作。

1992年后，我已年过60岁，考虑年轻干部的成长和担负重任的需要，我几次向中央组织部和省委提出退出省委班子的要求。直到1993年初，省级人大、政府、政协换届，我到省政协任主席。

从省委班子成员退出到政协当主席，是我个人一次较大转变，从执政到参政，由决策到献策。我深知，政协是我人生政治旅途最后一站，我要尽职尽责，圆满完成最后一站的使命。

八年中，我在中共委员、非中共委员中交了许多朋友，大家坦诚相待，愉快共事；积极参政议政，组织委员认真调查研究，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认真抓政协机关干部素质的提高，坚持年终民主讲评制度，使干部相互激励，健康成长；加强专委会建设，充实人员，发挥了专委会一个层次的协商议政作用；加强对市、县(区)政协的联系与指导，到全省100个县(市)、区政协机关，与他们座谈交流，相互借鉴，吸取下边好的经验；关心机关干部生活福利，积极改善职工住房条件，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辽宁省政协的多项工作，在全国都创了一流水平，受到全国政协的好评。我临退出领导岗位前，为改善省政协办公和

委员活动条件，积极争取并着手新建政协办公楼和政协会馆。

2001年，我年满70岁，愉快地退出政治舞台，回家过离休养老生活。开始未想写什么“回忆录”、出什么书，自认为平凡的一生，不值得叙述。

(四)

2002年9月20日，省档案局邀请一部分老同志开座谈会，动员、搜集老同志手中保存的有价值资料、照片等。我当时表示，我这些年保存了一些参加中央重要会议的照片、证件，准备献给档案馆；我这一生中，还记了不少工作日记，我离休以后考虑是否交省档案馆保存。

离休了，有时间了，我着手把多年笔记本往一起归拢。

我先到铁岭县委档案室(馆)，去取我当年寄存的笔记本。档案馆领导及工作人员，多都认识我，但当年老人儿都已离开，他们表示要帮我查找。我曾经前后三次去铁岭县档案馆听结果，回答说，未见踪影，并给了我书面回复。我找当年经手的韩永刚同志，说他已病故了；找到当年另一位经手人郑佩云同志，他因曾患脑血栓，一谈到笔记本事就笑，也不做回答，我失望了……

在法库县工作期间的笔记本，“文革”中都被“造反派”几次抄家给抄走了，“平反”后给退回的笔记本已是残缺不全了，尽管残缺，我也保存着。

1983年4月到1985年10月，我在省政府任副省长两年半期间的工作日记，约有20本也找不到了。因为从省政府过到省委工作时，当时的秘书也随我过到省委，又工作两年多。以后问他笔记本事，他也说不清楚了。

清理归拢的结果，现在保留下来的工作日记有200多本。

翻翻工作日记，往事历历在目，勾起许多回忆，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往事几十年，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

回忆“文革”，那乌云遮日、指鹿为马的年代，正确的说成是错的，黑的说成是白的，人妖颠倒，好人挨整，坏人翻天，哪有什么真理、良知、道德可言？

我的日记中，既包含着赏心悦目、愉快的往事；也饱含着辛酸、泪水与悲愤；也曾遇到不少困惑。要交档案馆保存，心中真有些舍不得。

我曾认真思索，个人日记交省档案馆保存，一般不会有人问津，可能会像石沉大海。反复考虑，想把日记中有些记事加以整理，留给朋友、后人，也许会对某些人、对某些往事，有参考、补充、验证的作用，还可能对档案起补充、辅助作用。但200多本工作记事，800多万字，从何处整理起呢？

“工作日记”有三个时段是完整的：一是朝阳八年，二是省委八年，三是省政协八年。我准备对这“三个八年”的日记，选择性地加以整理。

在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期间，工作记事是全的，共记了68本工作日记，几乎每天遇到的较重要事项都有记载。思考再三，就从“辽宁省委八年从政纪事”着手吧！

此间，我曾分管组织干部工作，掌管干部的选拔任用之权，深知责任重大，唯恐有失；本着立党为公的精神，按照干部任用程序选贤任能；个人从不封官许愿，从不擅自决定干部命运；后又兼任省纪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深感重任在肩，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客观对待每一件事情；凡亲手经历的较重大事项，都有记事，以防贻误；对有某些过失、错误的干部，尽力以教育为主，少施以惩处。

分管省委日常工作时，有很多会议场合要去参加并要讲话。凡是部门起草的讲稿，讲过后，都交回部门存档；凡是写作班子起草的，经过集体讨论，代表省委的讲话稿，也都交回存档；现在收入的一些讲话、发言、汇报材料等，都是自己亲手写的提纲，留存于工作记事本中，现加以整理，选入纪事中。

所收入记事，都保持当时原貌、真实性，也注明当时的时间背景，只对错别字加以校正；日记整理，是按时间顺序；对个别事情，为说明起因、经过、结束而采取跨时空、连接起来整理的，以给读者完整的介绍。

当年记事中，有关许多人事问题记录，除极少数几起，因常委内部涉及原则，不得已加以引用外，其余都予回避；也记载某些干部违纪事，往事如烟，都不再重提，个别不便省略的记事，也以×××代替。对某些敏感的记事，都未提及；个别需保密的事情，用模糊办法记述。

翻开当年记事，也有些流水账式的日常琐事，甚至鸡毛蒜皮，都一律舍弃。

经过两年多时间选择整理，在秘书张福涛与省档案馆同志帮助下打印成稿，交给出版部门审查，如能问世，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07年7月于沈阳

祝贺与期待

刘金树

我与老领导孙奇同志的最近一次较长时间接触，是在2006年1月。那一次，我应邀陪同孙奇同志参加一个文化方面的考察团参访台湾。1月，北国正值春寒料峭，而美丽的台湾宝岛却春意盎然。在10天出访的日子里，在阿里山，在日月潭，在台湾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了孙奇同志和我们10多人美好的记忆。孙奇同志虽然年近八十，但身体康健，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动作洒脱，使我仿佛又看到了10多年前勤奋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形象。

我认识孙奇同志是在1985年11月他到省委工作之后。那时我只是办公厅综合处的一个科级干部，尽管在领导身边工作，但与省委副书记接触是很难的。因为在省委从事文字工作的特殊条件，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或参加全省大会。听孙奇同志发言或讲话，总的感觉是思路清晰、概括准确、言之有物、符合实际，讲实话、真话和引人思考的话，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领导。后来听说他与我的老处长早年曾在一起工作过，如今虽地位悬殊，但孙奇同志不忘故旧，常常亲自或派人去看望老处长。有一年春节前，孙奇同志的秘书奉命去看望老处长，不知道他新搬家的地址，于是我便领他去了。我的老处长生性耿直，作风正派，工作扎实，敢于直言，是我1982年1月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后的直接领导和引路人。我尊敬和佩服我的老处长的为人，内心一直以他为榜样做事、做人。由于这层关系，平添了我对孙奇同志的尊敬和好感。

1987年1月开始，我由综合处调任信息处副处长、处长，在工作和文字上便与孙奇同志有了一定接触。每次接到孙奇同志在信息简报上的批示，总感觉意见明确、肯定，很有见地，落实起来也好办。特别是

对一些较为复杂问题的批示，更是旗帜鲜明，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作为省委常务副书记，办公厅有些事情是应当请示孙奇同志的。1987年，为了加强全省党委信息战线同志的业务培训，我和信息处的同志编写了一本《信息工作手册》，大家想请孙奇同志作序，以示领导重视。报告打上去后，我们心里打鼓，生怕孙奇同志因工作忙不能写，结果很短时间就收到了孙奇同志签字的序，大家高兴极了。1992年10月，几个同志为配合我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编写了一本《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市场》的书，请孙奇同志题词，他又很快为我们题写了“利用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大好时机，发展辽宁的外向型经济”。我们这些机关中的小人物，在与省委领导的交往中常常是惴惴不安的，生怕做错了什么，而孙奇同志因为长期做群众工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1996年初，我因在办公厅分管督察工作的关系，需要兼任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两会”期间的一个晚上，政协领导给新委员发证书，孙奇同志第一个给我发证书，充满感情地说：“欢迎你，金树同志。”时隔三年没见到老领导，我内心很激动，孙奇同志也很激动。从1985年底到1993年底在省委工作的8年中，在我的印象里，孙奇同志是一位很优秀的领导同志，尤以惯讲真话、敢讲真话被人称道。经过“文革”的“洗礼”，人们对讲话有了讲究，说空话、套话、正确的废话的多了，而讲真话却成了很难的事。讲实话、真话难，顶住一定压力敢讲实话、真话更难，坚持自己的性格一辈子讲实话、真话更是难上加难。春秋代序，时事更迭，8年中省委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我在省委工作了21年多，在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也干了10个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孙奇同志不改初衷，始终是讲真话，办实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原则，他的睿智，他的平实，他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都表现在讲话中，写在他的日记里，写在听过他讲话的人们的心里。孙奇同志除了一些大型会议的讲话用稿子外，一般都是自己亲自动笔，不用秘书代劳。我曾经多次听过他的这类讲话，精辟、简短、富有新意、发人深省。有些领导干部的讲话越讲越长，越讲越平常，空话、套话连篇，这是他们威信越来越低的重要原因，即便结集出版，也不会有人愿意

看。孙奇同志身在其中，却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台湾一行，一路上我一直向孙奇同志宣传，请他把有关个人的档案捐献给省档案馆，作为名人库的专人档案。因为人比较熟，孙奇同志显然听进了我的意见。参访回来后的一天，孙奇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谈谈他的日记捐献问题。我和于在海同志马上带领档案馆利用部的同志赶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孙奇同志已经在等候我们了。这一次，孙奇同志向我们捐赠了他担任省级领导期间参加北京会议的一些照片和出席证件，并给我们看了他的日记。这些大大小小的日记，记载了他在铁岭、朝阳、省委、省政协工作的历程，除了在铁岭的日记遗失了以外，其余朝阳8年、省委8年和政协8年的工作日记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孙奇同志很健谈，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讲述了一些事件中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惊叹他惊人的记忆力，虽然年过古稀，头脑还是那么清晰，对曾经发生的人和事的描述恍如昨日。从他对历史的讲述中，我捕捉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可贵节操：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面对压力而不改求实本色。翻看孙奇同志给我们展示的200多本日记，我颇多感慨：作为高级领导者的孙奇同志，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如何写下如此浩繁的文字的，又是如何能够在几十年中坚持下去的？这一次我代表省档案馆接收孙奇同志的档案捐赠，我们去的同志受到了教育，也答应协助他整理日记。

“文如其人”的文，应当包括所写的文字和发表的讲话。文贵真实，不能忸怩作态，不能无病呻吟，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大话唬人。文风常常是党风、学风的外在体现。因此，从毛泽东同志开始，我们党都提倡有一个健康的文风。讲短话、讲真话、讲实话、讲管用的话，是群众一直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而这种期望常会落空，言之无物、夸夸其谈、长篇大套的讲话仍然比比皆是。孙奇同志的讲话恰恰是独树一帜的，因为他的讲话是写在日记本上的，便不可能长；他历来又是善讲真话、实话、直话的人，求真务实、实实在在的人。直言需要雅量，如果没有容人的雅量和雅量环境，直言的人就要遭殃。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人际条件下，无论为官为民，直言是要有胆识和付出代价的。这一点“文革”已经给我们上了很深刻的一课。由此我推测，孙奇同志在“文

革”期间开始记日记，既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也是防止有人曲解的自我保护措施，而一路坚持下来，坚持几十年，实属不易。他的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负责精神令人钦佩。因为“真”，这些日记显得弥足珍贵，正好弥补了同期档案的不足。我作为档案局长感谢孙奇同志对档案事业的贡献。

欣闻《孙奇日记——政协工作八年纪事》公开出版，衷心表示祝贺与期待之意。祝贺孙奇同志的辛勤耕耘所取得的成果面世，期待孙奇同志的其他日记也能陆续出版，期待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能像孙奇同志那样讲短话、真话、实话，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一个良好的文风和党风，则党的事业幸甚，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2007年7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1)
祝贺与期待	(1)
1993 年纪事	(1)
1994 年纪事	(31)
1995 年纪事	(77)
1996 年纪事	(133)
1997 年纪事	(199)
1998 年纪事	(253)
1999 年纪事	(311)
2000 年纪事	(387)
2001 年纪事	(459)